

德国移民问题与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

宋全成

(山东大学 欧洲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后,德国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社会问题成为德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德国人内部针对移民存在着广泛的不信任和防御心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暴力排外行为。其原因在于德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大众不愿意承认德国作为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存在的事实。从2001年起,德国拟制定新移民法,以解决德国移民问题。

关键词:德国;移民问题;移民国家;移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4)01-0151-06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1990年德国的统一,进一步加快了德国作为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的进程。在德国普遍存在着对移民的不信任心态和针对移民的排外暴力。但是,在21世纪以前,无论是德国政府与政党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都不承认德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社会事实,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移民社会问题。从2001年始,德国政府开始转向,拟承认德国作为非典型意义上的移民国家的事实,并着手制定一部移民法。本文拟就德国针对移民的不信任心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排外暴力和德国新移民法将遵循的原则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针对移民的不信任心态及排外暴力

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政府不承认德国作为事实上的移民国家的存在,德国的移民问题缺乏法律上和社会政策上的支持而变得日益严重,也由此产生了德国人对移民的不信任心态。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在“本土的”和“外国人的”各种不同的人群中,产生了新的紧张关系和恃强凌弱现象:在西部,首先是西部德国人针对东部迁移过来的德国人的不信任和怀疑;在东部相反,东部德国人经常面对着无所顾忌的西部占

领者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充满同情心的发展救星(Entwicklungshelfer)、严厉的传教士像踏入半殖民地状况一样的西部德国人。同时,在东部还存在着人种的社会尊重和种族主义的歧视问题,如在日常语言中,有一系列针对外国人的蔑称——“Briketts”(Afrikanern)和“Fidschis”,在西部也有“Ittakern”、“Kuemmeltuerken”、“Kanaken”等。在西部,针对移民的各种不信任也在日益增加:一是关于来自东部和新的联邦州的迁移来的移民的不信任;二是对操德语的外迁移民,主要是跨洋的移民和操德语的外迁移民,对操外国语言的来自于原先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的不信任;还有跨洋移民,说德语和外国语的外迁移民共同对外国人,首先是针对土耳其人的不信任;最终是在整个德国作为本土的德国人和外来的移民组成了协调一致的防御前线,以对付那些来自于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避难申请者和难民。在各种新的移民不信任情况中,最有特点和怪诞的是:德国人和本土的外国人,同心协力,共同对付新迁移来的陌生的德国人(主要是来自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操德语的外迁移民)^{[1](P357)}。

现实情况是,除去第一代的先锋移民以外,德国的土耳其人在通常的情况下能说流利的德语,相反,

收稿日期:2003-09-20

作者简介:宋全成(1964—),男,山东青岛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德国 Osnabrueck University 访问教授。

基金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项目。

年轻一代的俄罗斯德国人,他们对新的家乡语言,经常是几乎不理解,或者作为外语,必须重新学习。这就出现一种滑稽的遭遇,例如在语言方面,一个本土的土耳其人携带外国护照,可以帮助一个携带德国护照的其他语言的外迁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外迁者是陌生的、缺乏社会适应技能的,而本土的外国人拥有社会适应技能、操熟练德语,却由于没有德国国籍而败于外国人和陌生的德国人。在没有美好前景的移民状况中,年轻的本土外国人,以这样的态度方式对待其他类型的移民和自身:从人种社会的竞争对手的不安和明显的过分适应,到针对政治避难寻求者和其他难民的敌对的武力行为。同时,与敌视外国人的不法行为相联系,本土外国人的怀疑也在不断增长,针对难以驾驭的“非移民国家”的联邦共和国,他们通过感觉到的不公正的生活前景、在政治参与和机构参与中的各种形式的歧视,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与德国的本土人相比,不是作为外国的同国人,而是作为国内的非国民意义上的二等的非德国国民。

像移民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种族阶层的形成和社会歧视的种族的合法性,对于社会的认同和多种族的并存及多文化的生活方式是特别危险的。这些危险通过东西德不同的影响而得到了加强:在心理上那些来自于东部迁移者的陌生的德国人,被打上了特别的(种族国家)的印象,他们带着潜在的防御心态来到了西部,他们发现自己已陷入一种误以为没有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影响的德国文化的同质性的无历史观念的妄想中。另外一种影响是普遍对来自东欧的移民人群的忧虑:吉卜塞人(流浪者)恐怖症。他们误以为,来自罗马尼亚的罗马移民祖先,像以前表现出来的高度现实性的侵略潜势一样,将激起随之而来的移民运动的失调。附加要说明的是:在许多东部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地区,在几十年来的极权主义的恐怖结束以后,依然有残暴的地下活动(或暗流),像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好斗分子,他们自己理解为种族——民族主义的解放运动。这些与欧洲东部的社会爆发相联系的冲突和对立,附带着德国自己就存在着的敌视外国人的防御态度和潜在的暴力的局限性和公开的合法性,共同汇成了针对外国人的暴力犯罪行为[2](P468)。

德国统一以后,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行为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德国新种族主义的恐怖行为发生在下列地区:1991年9月17日到22日,在东部Hoyerswerda那里,政治避难申请者从他们的住所中

被新种族主义分子驱赶出来,在被运走的公共汽车上遭到石块的攻击,而且被击伤。在Rostock-Lichtenhagen,1992年8月23日到27日,政治避难申请者在公众的注视和公开鼓掌下,在他们已被焚烧的住处被围攻和遭到攻击。在西部的“Huenxe”,1991年10月3日,两个难民的孩子被种族主义分子用火烧成重伤。在“Moelln”1992年11月23日和“Solingen”1993年5月29日,很久以来就有德国人居住,并在那里出生和成长的土耳其家庭的成员,在他们的房子里被烧死,或受重伤。在1994年3月25日晚上,在Luebeck,1938年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屠杀以后的德国历史上,再次点燃了犹太人教会的教堂。据德国内务部统计,1992年德国发生2544起仇外暴力事件,1993年又发生1609起,2000年发生了德国统一后历史上创纪录的15651起排外暴力犯罪案件[3](P249)。

上述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以及其他城市针对外国人的骚乱,迫使外国人、特别是土耳其出生的年轻的拥有护照的外国人,形成了防御和进攻的准备,在整个德国增长着种族社会紧张状态的危险。特别是来自于其出生地国家的跨越国界的政治组织——政党这一冲突的潜在因素,如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德国的渗透,更增加了德国移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在土耳其被禁止合法存在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在德国的无数库尔德组织遥相呼应。这诱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德国存在广泛移民但又不承认移民国家的背景下,在法律上确定一个外来移民组织的政治和种族文化方面的义务的法律分界线是非常困难的。在德国的土耳其库尔德人,要求庆祝他们库尔德新年活动,这涉及到德国主流文化与移民群体非主流文化的保留及德国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在此后的1994年3月流血的库尔德人游行示威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另外,在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地位问题,历来得到欧盟成员国在道义上的支持。处于对西欧民主政治的理解,在西欧许多国家看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有其合法的存在理由,土耳其政府不容许其合法存在,恰恰说明:在土耳其国内存在着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压迫,也说明土耳其政府尚缺乏像西欧国家一样的民主体制。正因为如此,欧洲联盟在东扩问题上,将土耳其排在东扩候选国的最后。这也使得库尔德工人党和在德国的库尔德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似乎有其合法的依据。但是,在德国社会整合的层面上,上述移民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显然也

是德国社会移民群体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

德国社会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行为,引起了世界各新闻媒体和许多国家的关注,这自然使人们回忆起了以种族灭绝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因此,各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统一后德国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行为,不是用“法西斯主义的”,就是用“德国的”来称呼。实际上,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行为在其他的欧洲移民国家中也同样存在,而且在欧洲已经有着长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作为宗主国——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从其殖民地国家中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英国的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和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主要接受了其北非的殖民地的移民,而荷兰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在葡萄牙则主要是来自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移民。尽管上述欧洲的殖民地宗主国,在外来移民加入国籍、赋予同等的国民权利和义务、社会一体化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但是移民在就业、社会福利、平等方面所遭受到的歧视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另外,移民在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与本土的国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争夺和冲突,导致部分政治家和社会大众惊呼:我们的“社会福利之船已经满了”。因此,在国家政治和社会大众两个层面上,出现了反对外来移民的强烈呼声。

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以反对外来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政党,在欧洲上述国家的议会大选中,得到了部分选民的有力支持,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反对外来移民的右翼政党——法国的“民族阵线”主席勒庞在法国总统大选中击败了诺斯潘,奥地利右翼政党——以海德尔为主席的自由党在议会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富图恩为主席的荷兰右翼政党在荷兰议会大选中取得胜利等等,尽管由于其他因素最终使上述政党主席未能进入政府,但是以反对外来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政党,得到了部分社会大众层面上的支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右翼政党的发展,对西欧传统和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社会大众的层面上,一些反对移民的极右翼分子无视法律和民主,对外来移民实施了犯罪的暴力行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英国白人下层的忧虑中产生的“光头运动”(Skim-Bewegung)、德国的“青年秃头”(Die jugendlichen deutschen Glatzen)、法国极端民族

主义分子都对政治避难申请者和其他外国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践踏和打击。即使在视为成功的瑞典也是如此,正如 Tonmas Lundin 所说:“在被称为移民政策成功典范的瑞典,排外和极右翼主义也在迅速蔓延,焚烧难民营,欺负外国人,散布种族主义,新纳粹动用暴力的顽固核心向所有‘非雅利安人’宣战。评论家们把事态的发展归咎于一度被人盛赞,而现在却失败的瑞典移民政策,归咎于经济态势。”^[4]

在统一的德国,新的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行为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针对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的残杀和迫害,以及大众媒体关于法律上的过激主义和排外的武力行为的轰动报道,使人们获得了德国移民社会不完整的画面。实际上,在统一的德国,也同样存在着大多数的德国人和少数外来移民共同生活的正常状态。这包括德国人出于乐于助人的善良天性和人道主义的义务,所给予外来移民的大量的无法估计的组织起来的和自发的友好帮助:从接纳和照料难民,到帮助联系和看管他们的住处,甚至在驱逐移民的威胁面前出身保护他们,而将遭拒绝的政治避难申请者非法的藏匿起来,使他们免于被政府驱逐出境的悲惨命运等等。

二、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

在关于德国对外国移民的恐惧和排斥的众多解释中,多是涉及到移民、一体化、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形态问题,德国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Osnabrueck 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的 Klaus J. Bade 教授认为,这只是涉及了核心问题的边缘。与移民、一体化和少数民族问题相比,寻找社会大众中的持续的迷失政治方向的排外态度和对外国人恐惧的社会和政策等深层次的原因,更具有根本和重要的价值。在社会和政策的层面上,一个明显的社会事实是:德国最近十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新类型的移民国家——不是从法律的意义,而是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然而这一社会事实却处于在政治上被否认和拒绝的境地。

德国政府历来否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议会和几乎所有政府机关的动议都认为“德国不是移民国家”。与此相联系,在社会政策上合乎逻辑地存在着的是外国人政策,而不是移民政策。1983年,围绕着“德国是否是一个移民国家”,进行了一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无聊的争吵。这里值得推荐和关注的是政府方面的解释或更正,认为历史上跨洋的典型的移民国家,经常是对原居住人进行排挤和消灭以后,才定居在大片的土地上,建立城市,发展

经济结构,并通过移民的进程,形成了社会和国家。因此,这样典型的移民国家,德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

由于政府否认德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存在,因此到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德国依然在“德国不是移民国家”的理念中,延长着自欺欺人的捉迷藏的游戏(versteckspiel)。在政治和政府的“上层”层面上,总是否认新型移民国家形式的存在,而在社会和社会大众的“下层”层面上,日常经历的是日益增加和强化的外来移民的跨文化或多文化的现实——“不是移民国家”的自相矛盾的移民状况。由于在政治和政府的层面上否认德国作为非典型的新型移民国家的存在,因此在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层面上,对于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和移民社会问题的解决,缺乏应有的组织结构上和政策上的有计划地准备。日益成长的移民问题的压力又反过来转向于社会的两个层面:(1)在社会大众的“下层”层面,面对着政治避难者、战争难民和其他非法移民的歇斯底里(Hysterie)、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以及社会福利、就业岗位相对减少的社会现实,在社会大众的心理层面上,充满了对日益增多的外国人的担忧和恐惧,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的下层、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的原东德人来说,外国移民无疑成为其社会竞争的有力对手。(2)在政党、政府和社会的“上层”层面,各政党在移民问题上争论不休,并以移民问题为手段攻击其他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致使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迟疑不决,一方面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外国移民,在事实上德国已经成为非典型意义上的新型移民国家,但另一方面,一向以日耳曼民族为自豪的德国政府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即使出于政党政治和议会选举的考虑,某些政党甚至政府也违背自己的初衷,而拒绝承认移民国家的现实,这在政治上就存在着一种合法性的危机。尽管在 1990 年德国统一之前,这一情况就已经存在,但在德国统一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面对移民问题,来自社会下层的一筹莫展和来自社会上层的政治上的合法危机的相遇,将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所崇尚的民主体系。这一严重后果尽管早被学者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警告过,但是在现实上却是徒劳的。结果是,在 1992 年威胁到议会民主体系的危机出现了。这让德国统一的功臣——联邦总理科尔在 1992 年秋天说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言论。Klaus J. Bade 和 Mainer Muentz 教授认为:“在 1991 年统一进程中和以后的对外国人的忧虑,

充满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暴力,不是作为不可避免的移民和社会融合的结果,而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相应机构和政策的可以避免的后果。它是在移民问题上和移民政治中缺少相应移民方案、计划和政策的一个攻击性的回答。这在 60 名研究移民的科学家撰写的 1993 年出版的《德国移民宣言》中已经指出了。”^{[5](P221)} 1993 以后,在移民问题上,无论在社会大众的层面,还是在政府和政党的层面,人们在观念上逐渐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人们由对移民危险日益增长的恐惧和高度的警戒主义,逐步转向于慢慢习惯和漠不关心的冷漠中。在 1994 年的大选中,出于新增长的排外的武力原因,由政党和各媒体漫不经心点燃的对政治避难的歇斯底里(Hysterie),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民的兴奋点从如下多个方面即移民、一体化和少数民族问题等高度爆炸性的题目领域迅速减退了。于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排外武力和暴力行为下降了。最近几年来,过去产生普遍“地震效应”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排外武力行为,只是在媒体报道中附带地被提及,像社会事故统计学的形式一样。警察发言人和其分管的地方代表也致力于:否认针对外国人的敌对背景,或者特别声明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行为,是没有依据可查的。从紧急告警和歇斯底里的位置,到达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和社会上的不敏感,这是社会心理学上的“异常警报”。显然,没有疾病判断力的病人,像人们知道的一样,是没有治疗能力的,国家也是如此。

三、德国新移民政策可能的拟定原则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移民和一体化政策问题上,德国政府拒绝承认事实上的新型移民国家,从而在机构和政策的层面上缺乏对移民问题的结构性和工具性安排,而现实社会中的大量移民存在和针对外国移民的排外暴力行为,政府力图淡化其存在。这样,在“政治性的捉迷藏游戏”中,德国政府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而且使得移民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成为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之所以说现在的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德国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为过去的移民问题只是德国社会问题的边缘化问题,它没有对德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全面影响;而现在德国移民问题则不同了。在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的层面上,大量选民对移民的拒绝态度和对外国移民大量增加的恐惧,使得以反对外国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政党迅速崛起。在经济的层面上,在德国 470 万失业人口中,有近 300 万是外国移民,面对国际间的移民浪潮,人们产生了

一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感受。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福利国家因为移民和迁移现象的大量存在而产生的强烈危机,深刻地感觉到“福利国家的福利之船已经满了,福利国家的人们再也不能负担起更多的移民”的社会现实[6](P441-442)。沉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负担,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研究移民文化的专家 Hechmann 教授认为,民族概念应理解为一个民族的一致性和团结性;自我表现意识的统一性首先是在一个国家机构中有共同生活的愿望、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政治观(共同的信念)和学术见解,而不是说生活在一起就是同一民族。而大量移民群体的存在和缺乏一体化的移民政策,使得外国移民较好地保持了自己所独有的民族文化。这就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出现了德意志“主流文化”和其他民族“非主流文化”同时并存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了“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和“保持多元文化”之争[7](P321-322)。

今天,在以德意志民族为核心的德国 8200 万人口中,有 8.9% 即 740 万人是外国人。大量移民的存在与德国政府缺乏移民的社会融合和社会一体化的准备,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但必须承认的是,外来移民及其所拥有的民族文化、特殊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与德意志民族共处于一个“伙伴社会”中,这种状况是不能通过政府的否认、拒绝和排斥外来移民来实现移民的一体化进程和与德国社会的真正融合。要对影响整个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的移民问题予以彻底的解决,就必须从德国发展的未来、德意志民族的长远利益、外来移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等多角度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对已不适应于移民新形势、新情况的作为限制的社会政策看待的旧的社会政策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并出台一项在政治层面和社会政策层面是“积极的”、“灵活的”作为社会政策的“新移民政策”。从 2001 年开始,德国成立移民委员会,就起草一部德国新移民法进行可行性研究。作为一体化的解决移民问题的社会政策的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似乎应基于如下几个原则:

第一,新移民政策必须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部分,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政府、政党和社会大众所关注,并以广泛的和一体化的计划来推进这项政策,因为移民政策和与之相联系的移民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社会问题的边缘性问题,而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核心任务。这是由如下三个因素所决定的:(1)亟待解决的是德国违背自己的意愿

而引进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的客籍工人和劳工以及他们的后代的国籍问题。(2)面临着日益下降的出生人口,如果没有作为社会政策的家庭政策的较大改革,劳动力人口的大幅下降,将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德国现有人口 8200 万,其中外籍人口 740 万,占总人口 8.9%。自 70 年代以来,德国出生率一直保持低下,1999 年的出生率不到 1%,人口数量多年来持续呈负增长状态。据德国联邦统计局预测,假设没有外国移民,到 2050 年,德国人口总数将减少至 5900 万。如果要在 2050 年仍保持现有人口规模,那么需要每年“引进”30 万至 40 万外国移民,到那时,外国人所占比例将达到 28%。除此之外,德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如果没有外来移民,2050 年德国就业人口将由目前的 4100 万减少为 2600 万,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届时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将翻一番,这无疑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德国必须走移民国家的道路。(3)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欧洲与当代美国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全球科技中心在二战以后从欧洲到美国的转移,迫使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必须借鉴美国成功的移民经验,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开放的移民新政策,以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人才到德国工作。德国劳动力市场多年来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紧缺的问题。虽然德国是欧洲失业率较高的国家,2001 年的失业率将近 9%,但是在某些高科技行业,特别是在与新经济相关的电子科技、IT 等行业,人才却十分匮乏。据分析,德国 IT 业至少缺少 5 万至 10 万名专业技术人员。造成这一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德国的高税收制度令就业市场吸引力不足,造成大量本国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德国高等教育体制过于僵死,例如没有学士学位,学制相对较长,德国年轻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28%)也远远落后于美国(44%)等西方国家,因而形成较大人才缺口。于是引进外来人才成为德国经济的迫切需要,直接关系到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8]。

第二,作为社会政策的移民政策,只有在其得到一个广泛性的、根本性的社会同意的支撑下,才能付诸实施并富有成效。显然,针对外国移民的社会政策的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一种非常自由的民主体系中进行的,而目前,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其他欧洲非典型形式的移民国家,无论是在政府当中还是在社会大众的层面,仍有不少社会大众对外来移民的到来存在较大的恐惧和不安,因此在社会

行为上,依然对移民有不同程度的拒斥和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从政府到社会层面的广泛的支持,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用移民政策的一体化的计划和长远的可预见的远景,而让这些人看到自己个人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不仅得到保证而且得到增加,从而消除这部分人对移民的恐惧和不安。显然,在政府和社会大众两个层面上,需要大范围的社会动员,以求得对移民文化上的宽容和平共处。只有这样,制定一体化的新移民政策才有可能。

第三,新移民政策需要一个欧洲视角下的协调一致的关于针对欧洲外部迁移的压力的整体计划,这一计划不仅作为“欧洲的防线”来抵御那些不期望的移民和非法移民,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清晰的和尽可能透明和人道的详细的到德国和欧洲国家的移民法规。因为德国是“申根协定”国,依据该协定,获得“申根协定”成员国一个国家的签证,就等于获得了前往其他成员国的签证^[3]。因此,德国的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申根协定”的视角,而且需要具有欧盟层面上的视角,特别是欧盟东扩以后,德国将面对原东欧国家移民潮的冲击。实际上,德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移民社会问题来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为全球化大大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间的跨越国境线的移民现象。但正如 Klaus J Bade 教授所说的,我们必须理解和面对日益严峻的移民社会问题,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简单地否认德国是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而束之高阁,我们依然有责任和义务去面对

和逐步解决移民社会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留给下一代,留给未来^[10](P6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府于 2001 年开始着手拟定新移民法。德国新移民法是否会获得顺利通过?将对德国移民问题的解决产生哪些影响?人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1] Klaus. J. Bade. Die Multi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 Menschen ueber Grenzerr Grenzen ueber Menschen [M]. Muenchen:Beck 1996.
- [2] Heckmann, Friedrich. Ethnische Minderheiten, Volk und Nation. Soziologie inter- Ethnischer Beziehungen[M]. Stuttgart: 1992.
- [3] 姚宝,等.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4] Tonmas Lundin. Migration und Entwicklung[J]. Deutschland Frankfurt: Frankfurter Societaets-Druckrei GmbH. 2000. 12.
- [5] Klaus J. Bade/ Mainer Muentz. Das Manifest der 60: Deutschland und die Einwanderung [M]. Muenchen: Verlage G. H. Beck 1993.
- [6] Weiner/ Myron. Studies on Interna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M]. Vienna: 1995.
- [7] Heckmann Fridrich. Ethnische Minderheiten, Volk und Nation. Soziologie inter-ethnischer Beziehungen [M]. Stuttgart: Enke Verlag, 1992.
- [8] 德国为何转向移民国家[N].中国青年报,2001- 07- 21.
- [9] 宋全成.移民政策的国家主权及其让渡[J].欧洲 2000- 10 - 10 .
- [10] Klaus J. Bade. Integration und Illegalitaet in Deutschland [M]. Osnabrueck: IMIS, 2002.

责任编辑:刘冠军

Immigration Issues in Germany and Immigration Country without Immigration Policy

SONG Quarr-cheng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the unity of Germany in 1990s, Germany has become a virtual non-typical immigration country gradually,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s have become the core of social issues. Disbelief and defence psychology has existed widely among the native Germany and the immigrants, therefore, a series of the violence and antialien actions have been generated. The reason behind is that the two classes, Germany political party & government and the masses, are reluctant to admit Germany existing as a virtual non-typical immigration country. Since 2001, Germany has prepared to establish a new immigration policy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mmigration issues.

Key words: Germany; immigration issues; immigration country; immigration policy